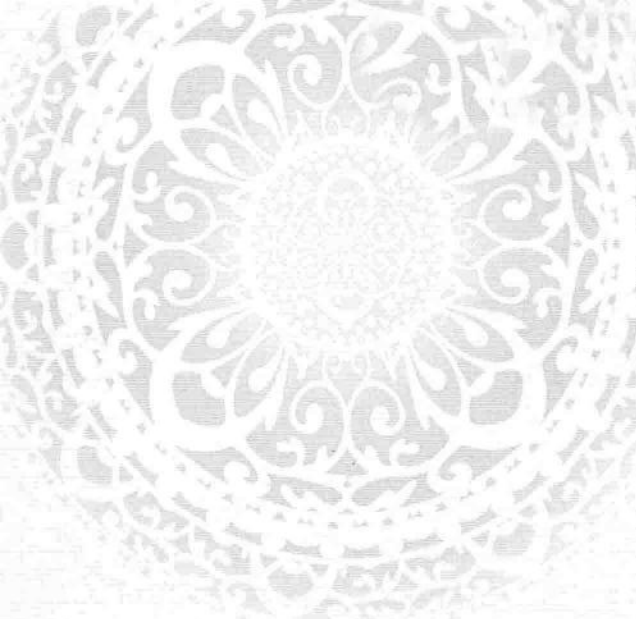


● 翁勇青 连念 林秀莲 编著

中国古代文书品析





中国古代文书品析

● 翁勇青 连念 林秀莲 编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书品析/翁勇青,连念,林秀莲编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615-3844-9

I. ①中… II. ①翁…②连…③林… III. ①文书-鉴赏-中国-古代
IV. ①H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3155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xmupress.com](mailto: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4 插页:2

字数:400 千字

定价:4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中国古代文书品析

(简介)

古代文书与现代应用文相比,有其独特的价值。历代许多优秀古典名篇佳作,实际上是优秀的古代文书作品。本书所选作品共 60 篇,从先秦至清代,包括诏、令、章、表、疏、奏、议、状、铭、记、誓、盟、檄、祭、卜、告示、策对、书信等不同文体的古代文书,按年代排列,从文秘、档案学、国家与法治管理视角作详尽的解读、分析、评述和研究,以求古为今用,促进现代文秘与档案学、行政学的发展,促进国家管理的完善与科学化。本书可作为历史、文秘、法律、行政管理、档案学等专业的学习参考资料,也可以作为海外留学生学习汉语文化的学习参考材料。

古代文书作品的形成发展与特点透析

——代为序

一、集文学与公文为一体——古代文书作品的重要特色

文体之说,有的学者认为,是“指文学的体裁、体制或是样式。文学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是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语言艺术。作者在从事创作时,为达到既定的效用,必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语言形式和篇幅、组织结构等,这样,就使文学产生了不同的类别,也就是各具特征的文学体裁”。^[1]古代文书作品,有史以来就是我国古代应用文体,同时也是古代文学的重要文体之一。而中国古代文学,向来就是以“诗文”为正宗,“诗文”中的“文”,以其体式之繁、作者之众、作品数量之多、思想内容之丰富,成为祖国优秀文化之瑰宝。“照传统的观念,文的体裁分类,并不完全统一,有的按用途分,有的按形式分,有的按性质分,总之,辞赋、论说、史传、序记、诏令檄移、章表书启、颂箴碑铭等等,累积起来不下百种。在如许繁多的文体中,有不少是古代应用文体,不属于现代观念的文学范畴;有些本不属文学的如论说、史传、章表书启(其中多数属于政论文)等类的文章不仅述事达意,而且表情明志,尤其是语言艺术,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向来就是文学家族的重要成员。”^[2]这是因为,我国古代文学历史悠久,内容十分丰富,而文学种类和各种文学形式也繁富多样。实际上,它们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往往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而不断演变发展。不少古代文论家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和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

2 | 中国古代文书品析 |

中都有共识,认为:诏、命、策、檄生于《尚书》,序、述、论、议出于《周易》,书、奏、箴、铭源于《春秋》。可见,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不论是在古代文学发展史上,还是在古代文书发展过程中,古代文书作品就不仅仅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应用文体,同时也是古代文学散文中的一种常见的重要文体,而且它还是“诗文”中的“文”,即散文发展的始祖。例如,“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商代和周初的铜器铭文,《周易》中的卦、爻辞,《尚书》中的殷、周文告等,可以说是我国散文的萌芽”。^[3]特别是,“《尚书》中的商、周文字,大都是由史官执笔记载的官方文告。其中有誓词、诏令、诰言、训辞和政事语录等,按后世文体分类讲,它们同属于公牍文类中的下行公文。这些文章的体制,一直对后代中央王朝的公牍文体有深远影响”。^[4]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古代文书作品之所以具有古代文学的“文”的重要特色,是文书作品的作者和应用者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结果,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创作与撰写要求。不论从古代文学发展史实考察,还是从古代文书作品撰写思想理论和方法看,我国都是一个散文非常发达的国家,而作为散文体之一的文书作品,是人们和社会组织运用它来为自己服务的产物。那么,为了运用得好一些,使其作用发挥得更大一些,就要求文书的制作者,包括执政者自己在内,都应当对其精心制作,以便使它更好地表达文书作者的要求、理想和意愿,反映本阶级的利益,使之能够“言之有文,行之天下”,即能够更好地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政治主张及其号令传播到四面八方。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春秋战国时代,我国杰出的思想家孔子就意识到“文”的重要性,指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书作为一种行政信息和社会信息,要使它传遍天下,或者说,文书作为一种指挥国事、处理政务的工具,要使它能够号令天下,是必须“言之有文”的。“无文”是不可能传遍天下的,更不可能成为一种作品,流传后世。因为只有干瘪的语言,或者是语无伦次的、不知所云的公文,需要把各方面的信息上传下达,或表达什么要求意愿,却又说不清楚,表达不了某种意愿,传递不了某

种信息,这样的文书,如何能使人们明白执政者的意图,又如何贯彻落实呢?这种文书是不可能为执政者所用的。所以,只有“有文”的文书作品,即鲜明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文采与形式兼备的作品,才能充分发挥文书作品应有的时效作用和长远作用。这样,从理论上说,就产生文书作品的表现能力问题,也就是文书作品的艺术性问题。于是,不仅历代的文学家,而且许多封建阶级的文人志士、政治家、思想家、行政管理官员以及有作为的封建帝王,都是非常讲究文书的写作的。其中有许多人既是出色的政务管理者、政治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优秀的散文家、杰出的文书制作者,如李斯作《谏逐客书》、贾谊作《论积贮疏》、曹操作《让县自明本志令》、包拯作《乞不用赃吏》等等。他们的文书作品具有较高文学价值,这就是古代文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的客观的史实。这些众多的文书佳作不仅成为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为我国浩繁的文献古籍和丰富优美的古代文学的一个亮点,脍炙人口,世代相传,经久不竭。如冯其庸先生在《历代文选》一书中所指出,“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比较可信的最早的散文,是《商书》的《盘庚》篇,这是商代的统治者晓谕他的臣民的一篇文告,现在读来虽然有难懂之处,但却大都是当时的口语。……这可以说是奴隶制时代的散文,其中已含有形象比喻,是后来发展得波澜壮阔的一条散文长河的开端”。事实上,无论是从文学的角度,还是从文书学的角度看,《尚书》就是当时的一种文告或是记录性文字的文体汇编,是我国上古时期的文书作品,这是为历史上的许多文论家所肯定的。那么,我们前面对古代文书作品的评价,既符合古代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符合文书作品发展的客观历史事实。为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代文书作品是完全可以称之为开启历代散文体文学发展的先河,并将文学的艺术性和文书作品的应用性完美地结合为一体的文章,这是它的重要特色。

应该指出,在古代文学和古代文书作品发展史上,许多文书作品,特别是一些书信体文章虽然作为一种应用文体,在当时起着处理

4 | 中国古代文书品析 I

政务、指挥国事、陈述作者意见、表达和反映社会要求以及传递各种信息的作用,由于它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因而人们往往将其看作书信体文学。如有人认为:“书信,古代称为书。书是总名,此外还有尺牍、简、笺、札、启、函、缄、柬、帖、疏等许多异名,名称虽然不同,实际指的都是书信。”^[5]但是,有许多文书作品虽然与书信有密切联系,然而其实质不是书信,而是一种奏疏或是诏令文书,属于公务文书作品,如秦朝李斯的《谏逐客书》、汉朝皇帝刘恒的《赐南越王赵佗书》及赵佗的《报文帝改帝号书》、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出师表》、隋朝李谔的《上隋高祖革文华书》等名篇。不过,这些事实说明,因为社会实践和人们生活的实际需要,文书作品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其内容,完善其形式,加强其艺术表现力,于是文书作品以其鲜明的艺术性,对历代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许多散体文章中,尽管散文也有不同的样式,但与文书作品的渊源关系是很深的,而且由于许多文书佳作艺术性极强,就自然被古今文论家视为艺术珍品,划入古代优秀文选范围之中,并成为其中的重要部分,成为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因此,我们既要认识文书作品在当时处理政务、管理国家的活动中,以及在如何表达作者思想和感情方面所体现的重要作用,也要充分认识文书作品在古典文学发展历史长河中的重要作用,切不可忽视或排斥其文学的艺术性。

显然,这种集文学和公文(应用文体)于一体的特点,就形成了古代文书作品的重要特色。历史证明,不论是从文学角度还是从应用文体角度,古代文书作品往往备受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文人志士的推崇和重视。但是,多年以来,不少人对文学与应用文体存在认识和观念上的偏见,如有的人认为:“书信在古代有着许多不同的称谓,如有的称尺素、书简、书札等,有的又叫做章、表、疏、奏以及诏、令、谕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不仅臣写给君的叫章、表、书、奏,君写给臣的叫诏、诰、令、谕,甚至连写信活动也下对上称‘上书’、上对下称‘赐书’了。因此,这类书信确实是瑜少瑕多,除史料价值外,文学成就就是不大的,不是宣扬德威恩惠,就是极力歌功颂德。为此本书尽

量不选。”^[6]这种情况,使文书作品不仅被拒于文学作品研究之门外,而且它又不作为文书学、秘书学、档案学之研究对象,因而,在这方面的专门文选和研究专著是不多见的。实际上,总结和研究古代文书作品的发展规律,学习和借鉴其中的有益经验,不仅对文书学、秘书学和档案学的学习研究,特别是对今天应用文(公文)的学习写作,包括对各种应用文体的繁荣发展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对于研究古代文化和古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乃至对于国家的科学管理,对于推动当今社会与经济的繁荣发展进步,也同样都是很有必要的。

二、人类社会发展的伴生物——古代文书作品的产生与发展

客观地说,古代文书作品与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同样是伴随着人类的共同劳动与生存以及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不论是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还是从古代文书发展史的角度,我们都可以将古代文书看成古代散文发展的始祖,但是,文学的起源,应该是早于应用体的文书作品。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人类语言的产生,是出自于人类的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的需要。这是因为古时候的人们为了互相表达思想和情感,为了共同的劳动与获得生存发展,逐渐产生了人类的语言。其次,我们也看到,“文学起源于劳动。有节奏、有韵律的语言艺术形式诗歌,最初就是在原始人类所从事的劳动过程中,伴随着劳动动作的节奏性而形成的。原始人在从事集体劳动时,往往出于减轻疲劳或协调一下彼此劳动动作的需要,而依照劳动动作的秩序发出一种呼声。这种呼声具有一定的高低和间歇,因而形成一定的节奏。当这种有节奏的呼声与表达劳动者心声的精炼的语言相结合时,便产生了一种有韵律的、富于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这就是诗体的起源”。^[7]然而,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慢慢地就不能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了,于是作为记录人类活动的文字也应运而生了。随着文字的出现,就自然形成反映人类各种社会活动的各种文字记录材料,这样就奠定了古代文书作品产生的基础。因为这时,人们在各种活动中,

6 | 中国古代文书品析 I

自觉或不自觉地产 生、形成了各种文字记录材料,或者说,为了某种需要而产生、形成了某种文字材料,那么,作为应用文体的文章或某种文字记录材料也就产生了,我们称之为“文书作品”。公文,一般可分为上行文和下行文两大类。“上行文”指的是臣民给君王的上书,或是下级官员给上级官员的报告,“下行文”指的是君王给臣民颁布的诏令等,都是应用性很强的文章。而文书,既包括公务文书也包括个人文书。实际上,古代文书作品主要的就是指古代朝廷、官府通常所使用的公事文,当然也包括私人之间的来往书信函件,同时,也包括诗书文献和文章等。

公务文书,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及其社会组织活动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各种实践活动,如发展生产、生存生活、经济建设、社会组织管理等活动的需要,特别是随着国家与政治组织和阶级的出现和需要而产生的。它作为处理政务、表达与联络人们思想感情、沟通联系社会组织各种信息的工具,作为适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应用文体,在国家与政治组织、社会发展中逐步发展起来。就如斯大林同志指出:“生产往前发展,出现了阶级,出现了文字,出现了国家的萌芽,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发展了,更需要有条理的来往书信。”^[8]这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完全符合的。范文澜说:“商朝有军队与监狱,甲骨文已有证明,《荀子·正名篇》说,‘刑名从商’,以意谓法律应取法于商朝,《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说,‘商朝法律在街上弃灰的要斩手’。刑法如此残酷,当然有一个被残酷统治着的阶级,这个阶级主要是奴隶阶级。”^[9]据史料记载,公元前 21—11 世纪的夏商时代,我国奴隶社会已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具有国家机关性质的组织机构也就出现了。此时作为以反映国家机关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各种公务文书,包括私人性质的文书,就自然成为统治者传达政令、处理国事、联结信息的工具和载体。如“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公务文书是考古学家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发现的甲骨文书,其中绝大部分就是殷朝后期几个王朝的活动和奴隶主的文告”。^[10]显然,人类社会的文字的发明创造,

为文书,包括公务文书和私务文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人类社会活动、阶级和国家政治组织的产生与运行,是公务文书与私务文书产生的直接动因。而此时为了运用而产生的文字作品,是一种散体的文告、文章,是应用性的文体文章,即文书作品。这也为文学界学者所共同认可,认为“我国最早的成篇散文,保存在一部名为《尚书》的文集中。‘尚书’即上古之书的意思,儒家曾尊它为经典,故又称《书经》”。^[11]

在我国社会发展史中,奴隶社会的夏商时代是古代文书作品产生的最早时期。此时“文书的书写材料以甲骨为主,辅之以竹木和青铜”。从发掘的几十万片甲骨文来看,其内容主要是记录殷朝后期几个王朝的各种活动情况,同时也比较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当时的各种社会风貌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情况。它表明“殷商奴隶制国家就开始广泛地应用文书作为管理国家的工具,产生了我国最早的公务文书,并且建立了一定的文书工作制度”。^[12]不仅如此,此时的文书作品的艺术性也已显露出来,并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如“《周易》中的卦、爻辞,产生的时代颇早,其中多有产生于商末周初的文字。卦、爻辞中的记事,虽然也很简短,但比起甲骨卜辞更趋完整,并具有某些生动的描写,有的还用简洁洗练的句子表达了某种生活经验以至哲理,是我国古代散文萌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13]而《尚书》的编纂,标志着我国具有文字记载的散文体文章的产生,标志着书面文书作品的产生。《尚书》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件汇编,记述了上古时代的时事政治、社会制度变迁、奴隶主国家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征战、国家的治理,以及天文、地理、人物与社会风貌等情况,是研究古代历史、古代文学与哲学、国家管理和古代文书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最原始的文献资料。

中国早期历史上的一个大动荡大变化的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此时诸侯征战,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思想大解放,有力地促进了古代散文的飞跃性发展,自然也带动了文书作品的勃勃兴起。正如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

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14]这个时期，许多文人志士、思想家、政治家为了争鸣，为了更好地向君主陈述表达政见，使其政见主张为执政者所接受和采纳，叙述问题时就自然要讲究文采，追求作品的艺术效果，注意运用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以便能够成功地对历史事件与场面进行记述描写以及刻画人物形象。于是《春秋》、《国语》、《左传》、《论语》、《墨子》等大批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就应运而生，其中许多篇章，情节生动，故事性强，刻画人物栩栩如生，性格突出，艺术表现力极强，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经典之作，形成上古时代散文发展史的一个高峰，并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古文”发展。正如褚斌杰先生指出：“这一时期散文的主要特点，是这些著作家们往往把哲理的思考、史实的记录与许多文艺手段结合起来。如他们在说理、记事时，极注意语言技巧，注意逻辑、修辞，注意谋篇结构，有时还调动许多形象化手段，这样一来，就使这些著作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史学、思想或政论著作，又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具有了一定的文学价值。”^[15]在这些散文中，恰恰有许多是属于当时的文书作品，或是文书作品所记述的内容在其中得到相当多的反映和记载。例如《论语》比较真实地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所言与所行，也是当时的一部语录体散文集，类似今天的“回忆录”、“谈话记录”性的文字材料。又如乐毅《报燕惠王书》、鲁仲连《遗燕将书》、范蠡《遗大夫种书》、荀卿《与春申君书》、范雎《献秦王书》以及《国语》中的《召公谏厉王弭谤》等篇，其主要内容是反映、陈述和记载军政国事，或是臣子对上司、君王的奏疏、报告，或是出于公务性质的往来函件等，均是地地道道的文书作品。它们对现实的反映不仅比较直接，而且针对性、应用性很强，都是直接运用和服务于各自的军政国事，服务于各自的帝王霸业，同时，其叙事简洁、语言精炼、含意深刻，为后世所推崇。这样，它们不仅成为当时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思想情感、社会信息交流的载体，而且更是处理政务，反映和解决国家与社会实际问题的工具。因而，在这个被世人称之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依然重视对文书作品的

拟制,讲究其写作技巧和文采,注重其篇章结构布局及其表现力,注意形成各人的不同艺术风格和语言风格,那么,许多成功的文书佳作的涌现,就自然是这个不寻常时代的产物。

文书作品得到长足的大发展,并日趋成熟的时期是在秦汉时期。这个时期,文书作品体式日益齐备和规范化、法制化,成为当时文书作品发展的重要特征。秦王朝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称帝于中华,确立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制度。秦王朝为了朝廷政务管理和维护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就必然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文书工作体系和制度。为此即须从法规上明确规定文书作品的拟制、运行处理和文书的名称、体式种类、用途及文书的运作程序等。对此,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也指出:“秦初定制,改书曰奏。”虽然说,这种对文体名称的规定,体现了封建帝王思想与权威,但是它在古代文书理论上是一个新的发展。因为这对当时来说,是执政者为维护其统治,为管理好国家和公文运行处理所必需的,就如潘嘉所说:“秦始皇为了通过这些文书能够更好地了解下面的情况,有条不紊地指挥国事,贯彻君权,为专制统治服务,也确实有必要对皇帝所颁发的和臣僚呈上的文书名称、用途加以严格的规定。”^[16]事实证明,这样做既便于文书的保管,便于文书的阅读,同时也便于政务管理。于是秦朝的文书撰写制度的改革,也就为后来取而代之的汉王朝所沿袭。此时,文书作品不仅适应了封建统治和国家管理的需要,而且很自然地、深刻而又广泛地反映了秦汉时代社会生活和国家管理的各方面,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表现出极高的艺术成就。例如秦朝李斯的《谏逐客书》,汉代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贾谊的《治安疏》、《过秦论》和《论积贮疏》,晁错的《言兵事书》和《论贵粟疏》,东方朔的《答客难》,刘向的《谏营起昌陵疏》以及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书》、陆机的《移百官文》等文章,还有及董仲舒、王符、崔实、司马迁、班昭、班固等人的许多卓有成就的文书作品,它们结构严谨整齐而辞藻华丽,论证纵横有力而气势逼人,比喻形象生动而富有说服力,感情浓烈而能把自己的情感抒发倾注于所用的史事和典故之中,成为我国古代文书作品

一种特有的艺术现象。两汉三国之时,文书体式逐渐齐备的原因是,一些著作者往往以撰写某类文体而著称,如蔡邕善写碑文,孔融、曹植、王粲等,见长于或善写书、记,或善写表文,于是各式文书体文章都能得到充分发展。还有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称为“文学为自觉时代”。在此期间,孔稚珪的《北山移文》、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曹操的《求贤令》、曹植的《求自试表》、丘迟的《与陈伯之书》等文章,能够做到文与质相结合,并有所创新,许多文章文采辞藻华美,风格清新通脱,说理抒情相宜,成为当时的文书佳作。当然,也应当看到,此期间,骈体文的出现,深刻地影响了应用性文书作品的写作,不少著作者在文章中讲究句式整炼,讲究词语对仗,追求形式的完美。这种文体产生并鼎盛于魏晋南北朝,虽然遭到一些执政者和文人的批评反对,但对后世文书作品的发展影响至深,乃至清末具有革命性的太平天国领导人洪仁玕等代表太平天国发布的一篇诏谕训令《戒浮文巧言谕》,也难免有骈体文的痕迹。

隋唐宋时代,特别是唐代与宋朝,是我国古代文学全面发展的时代,也是古代文书繁荣发展的时代。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多年分裂战乱的局面,使中国又归于统一。此时,为适应其政治统治、国家管理与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隋王朝对应用文体文章的撰写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如以李谔的《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为代表的奏章,能够站在维护统治集团和国家管理的高度,提出从封建法律法规制度上大力改革当时的文风,并由隋文帝颁发诏令,明确地提出“艺文之末品,政事之先务”,要求文书作品应当首先为政事服务的文书学思想主张。因而,这种思想和制度的提出,无论是作为一种执政管理制度,一种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和要求,还是作为一种文书作品撰写的思想理论,都为唐宋文书作品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古代文书作品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是唐朝,它是唐朝社会经济与文化高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这个历史时期国家管理和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反映。唐太宗出于治国与朝廷管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再晓谕官员对文书奏章和诏令的起草和审核要严肃

认真,不得有任何马虎行为,指出,如诏书“不稳便,皆须执论”,否则就会酿成“万人之大弊”、“亡国之政”。^[17]值得一提的是,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的唐代“古文运动”,反对六朝以来盛行的骈体文,提倡秦汉时期流行的散文,虽为复古文化,实为一种文学革新运动,有效地改变了骈俪文体的文风,出现了思想内容深刻、艺术表现力强的文书作品。魏徵的《十渐不克终疏》、《谏太宗十思疏》,韩愈的《谏迎佛骨表》、《争臣论》,柳宗元的《驳复仇议》和《封建论》,李白的《与韩荆州书》,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陆贽的《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等等均为唐时的文书佳作。他们能够充分运用文学艺术手段,做到抒情议论相结合,笔意纵横,记事写人状物,形象生动;其语言的精炼、文体的变化、意境的深化、思想的升华,使文章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同时他们又能够做到“文以致用”,使文章为国家政务管理、社会发展服务,并尽可能与完美的表现形式相结合,创造出我国文书发展的重要的成熟时期。而宋朝文书作品的发展,仍是唐文发展的继续,欧阳修等人继续举起“古文运动”的大旗,对文章的语言形式、文书体式、直至思想内容,都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这种情况,就如褚斌杰所说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运用文学的构思,语言的修辞,以及谋篇的技巧、音节的顿挫等各种手法,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古代散文的艺术性,以致使某些传统的应用文、公牍文,也成为文学佳品。”^[18]古代文学史上的这些现象,实际上包含应用性文书体文章。其间文书作品名篇林立,作家辈出,如欧阳修的《朋党论》、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苏轼的《教战守策》、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包拯的《乞不用赃吏》、岳飞的《南京上高宗书略》、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等。许多名篇论证气势纵横,说理深刻,思想鲜明,多有新意而不落俗套,显示了春秋纵横家文风,表现出文书作品思想内容丰富深刻,且艺术表现力强的特点。这些文书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宋王朝社会生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与衰退的过程,反映了统治集团革新与守旧的政治斗争和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斗争,并能使许多文书作品根植于苦难而动荡的时代土壤之中,如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民英勇

抗击外族入侵的爱国主义精神,形成这个时期文书作品的时代特色,标志着这个时期是文书体式臻于完备而其作品快速发展的鼎盛时代。

元明清时代,文学的发展,主要体现于新兴崛起的戏剧、小说等文体,文书作品的发展,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也日近黄昏,与唐宋时期相较,显得逊色。元王朝时期,思想禁锢,散文被当作“文以载道”之工具,整体的诗文创作比较衰落,作为散体文之一的文书作品,逐渐与文学分离,成为纯粹应用性的公文。此时,散文佳作不多,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文书作品也不多见。及至明清时代,统治者为维护其政治统治地位,依然致力于思想封闭,而文书写作又不为当权者所注重,出色的文书佳作也就自然地少了。然而,学术研究活动在这个时期还是活跃的,这样对公文写作也就产生了良好的积极的影响,涌现出不少成功之作。如明朝海瑞的《治安疏》、张居正的《陈时政疏》、张煌言的《复郎廷佐书》,清朝洪亮吉的《出关与毕侍郎笺》、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以及太平天国将领洪仁玕的《戒浮文巧言谕》等文书作品,都是这些有识文人和有为官吏,在其公务政务活动中形成的。它们大都是有强烈的思想性,观点鲜明,论述详尽,说理透彻而又具有雄伟的气势,显示出极强的艺术表现力、说服力与感染力的文书作品。特别是秋瑾的《普告同胞檄稿》、章炳麟的《讨满洲檄》等文,不仅写得流畅而有气势,而且更是思想深刻、结构严密、革命性和战斗性强的檄移文书,被鲁迅先生称为“不朽的业绩”。^[19]这些都代表着晚清文书作品的进步方向,是晚清黑暗中的亮光。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1912年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华民国宣告成立,随之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也就宣告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终结。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文书作品作为古代散文的一种重要应用文体,也曾经作为封建社会时期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以及作为传递整个社会信息,特别是行政信息的媒介,其旧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但是,文书作品作为人类社会和国家管理的工具与信息传媒形式,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又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此时,文书作品必须适

应新的统治阶级、新的政治集团、新的国家管理、新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新需要,而且必须为之服务。于是,文书作品就自然要能够以其创新的形式、创新的内容为新的国家和新的社会经济发展而服务,并仍然伴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这是文书作品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

三、历史的比较与透视——文书作品的鲜明特性

上述可见,古代文书作品的发生和发展伴随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发展而历经了悠久的进程,在这个悠悠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积累了浩瀚丰富的文书作品,而浩浩荡荡、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大浪淘沙出宏伟壮观的文书佳作。其重要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这就是它既是中国古代散文和文学遗产的重要一部分,有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包括文体形式、作品思想内容、表现手法、语言表达与艺术技巧等方面都有相互渗透、相互演变、相互发展的过程,同时,又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独立的、发展完善的应用文体。事实表明,任何文种文体,包括文书作品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往住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组织、社会管理、人类生活发展进步的需要,以及人类社会语言不断发展变化,作者创作与撰写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果,进而形成作者与作品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艺术手法、作品题材、撰文风格、作品特点的不同。因而,文书作品与整个散文及其文学大家庭成员相较,其自身鲜明的特性是显而易见的。

(一)与生俱来的鲜明的应用性

这是古代文书作品固有的特性和最重要的基本特点。文书作品的产生和发展变化过程,是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思想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生产活动、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并且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例如,作为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尚书》,不仅汇编了春秋战国以前历代史官所收藏的政府重要文件和政论性文章,其中大都是古代公文,同时也把与时代相适应的公文体式、公文类型、公文作用都体现出来。其中的《无逸》,反映的是周公归政时,谆